

甘孜藏族自治州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赠阅

270796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泸定县专辑)

泸定县政协供稿

政协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编

22, 2707965
2011
4

目 录

建置沿革	阳昌伯 (1)
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	泸定县政协文史组辑 (4)
泸定桥概述	文荣普 (11)
康熙误笔与泸定县名由来	阳昌伯 (21)
泸定土司历史	席珍、阳昌伯搜集整理 (26)
回忆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	郑世杰 (33)
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	倪德元 (36)
回忆我的父亲	周五炯 (40)
寰品文事略及其泸州起义回忆	阳昌伯、宋玉春整理 (46)

天主教在泸定的始末

.....阳昌伯 (62)

泸定人民的反帝反清运动等

.....阳昌伯 (68)

袍哥在泸定的情况

.....李远钦、郑成基 (72)

“岚安事件”回忆

.....曹本厚 (75)

清初化林、泰宁、阜和三协兵制演变考略

.....张康林 (80)

李含章与长春堂

.....范述方 (94)

“岳公爷打大岗”是讹传

.....阳昌伯 (98)

磨新琐谈

.....王福安 (101)

古道、背子、口溜

.....倪德元、席珍、阳昌伯整理 (107)

编后记

.....马崇正 (111)

附录一 聚德永之名

建置沿革

阳昌伯

泸定在古代，按《尚书·禹贡》九州，属梁州西部。周、秦时代，则是“管国”的地方。所谓“管国”，是对古羌族之进入河谷地区兼营农业者的统称。

汉武帝开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前111）置沈黎郡，治管都县，本县为管都县地，郡治即在今沈村。天汉四年废郡，为牦牛一县，属蜀郡西部都尉。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属蜀郡属国都尉，从灵帝到蜀汉都属汉嘉郡的牦牛县。

西晋时仍属牦牛县，至成汉时，复于牦牛县置沈黎郡，领城阳、牦牛、晋乐三县，泸定属晋乐县。县治在沈村。

南北朝时，南朝政权实力未到川西高原，四川地区尽入西魏版图，晋乐县的汉人已内徙，成为江原郡的侨县了，到隋代，泸定地区在嘉良范围内。

原居住在丹巴的嘉良族，因内乱支分来泸定居住，附唐请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在泸定设置嘉良县，县治在今嘉靖河坝。贞观初废县改设嘉良羁縻州，隶雅州都督府，后来黎州都督府。唐末附吐蕃，更号“嘉靖”。

唐高宗仪凤四年（679）析汉源县置大渡县。大足元年（701）改属黎州。武后长安二年（702）划入飞越县。仍留戍守称大渡戍。乾符二年（875）就戍所筑大渡城。其城在泸定沈村。唐代在泸定废县后，境内曾设许多羁縻州：隶雅州的有罗岩州、当马州；隶黎州的则有河东州、大渡州、上贵州、贵林州和叶（野）川州。罗岩即今岚安，当马即今岔道、嘉靖，河东、大渡即今冷碛至得妥一带；上贵州即今康定、贵林即今鱼通，后又称下贵州，叶川州则

相当于新兴、磨西地面。这些羁縻州的名称一直保持到宋代。尽管当时有这样多的羁縻州，但其中最强大的部落为“三王部落”即天全的杨王，汉源的郝王，驻牧沈村的刘王，本县成为刘王的领地。（今沈村“白马坟”即刘王墓）。这个局面，保持到整个宋代。三王之下又有许多小土司。

元世祖忽必烈亲率元军由阿坝循大渡河谷南征大理途中，把黎州、碉门、冷碛、沈村、叉道、岩州并为“天全六番招讨司”，把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土司并为一个宣慰司。并在烹坝境内置长河西营军万户府，因此泸定河东地区隶天全六番招讨司，而河西地区则隶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了。

明代在泸定境内复置三土司即：沈边长官司，辖佛耳岩以下河东地区，和新兴、磨西、德威等地，以扯索坝观音岩为界；冷边长官司，辖佛耳岩以上至岚安河东地区；长河西千户所辖河西自扯索坝观音岩至今康定大藏桥。

清初沈边土司和冷边土司于顺治九年（1652）内附，沈边隶清溪县，冷边属天全州。长河西千户所，清初为青海和硕特部所并，康熙四十年（1701）平定西炉后，复其土千户职，改称咱里土千户，统辖于打箭炉明正土司（即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

清初于化林坪设“汛”，康熙二年（1663）改汛为营，设守备、标兵一营，三十四年（1695）设参将，四十三年（1704）改营为“协”。设副将，辖中军备守一营，驻化林，分辖把总三员，驻防泸定桥、打箭炉、泥头三处，各配兵五十名。所有汉土官兵皆受副将统辖。雍正七年（1729）移副将泰宁，化林改置都司。

雍正六年（1728）置泸定巡检司，管理铁索桥和沈村烹坝驿站，隶雅州知府，光绪三十年（1904）隶打箭炉同知。宣统三年（1911）与化林都司同时裁撤。是年赵尔丰实行改土归流，收缴泸定各土司印信，置泸定桥设治委员，同年七月初四，布告改为

泸定县，因四川掀起保路同志会运动，旋即暴发辛亥革命，设治未果。

民国元年（1912）川边经略使打箭泸镇抚府将沈边土司和化林营汛防地改为化林县；冷边和咱里土司地改为泸定县。民国二年（1913）改化林为县佐，属泸定县，由此，泸定成为单一的县治。民国三年（1914）属川边特别行政区镇守使。民国十四年（1925）属西康屯垦使。民国十七年（1928）属二十四军西康政务委员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属西康行政督察区。并将化林县佐并入二区。是年五月毛主席率一方面红军长征过泸定桥北上，十一月红四方面军从丹巴南下进入岚安境内，建立岚安苏维埃政府。民国二十八年（1939）直属西康省政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通电起义，一九五〇年三月解放军经泸定进驻康定，康区正式解放。泸定县纳入康定专区，十一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州政府成立，划泸定为其属。一九五五年十月，西康省撤销，泸定县属四川省雅安专区，一九五八年又转划属甘孜藏族自治州。

任乃强教授对泸定古代建置的考证

文史组辑

编者说明：任乃强教授，现已九十高龄，一生研究康藏史地，造诣很深，著作丰硕，对泸定古代情况尤为熟谙，曾著《泸定导游》一书问世。对我县史志工作，热心支持，请教问题，耐心解答。《泸定历史沿革》一稿，亲予批阅，提供近年考证所得，并叮嘱：“凡我考证之处，请公开讨论，征集新的不同意见，趁我在世之日，进行修改”。意诚情切，感人肺腑，特将几次来函，摘要刊出。敬希读者，参与讨论，提供宝贵意见。（小标题是编者加的）

一、周、秦为“管国”地

笮（管、笮音义同）皆是指的溜索桥。古代康藏高原的羌人作此方法渡河称之为笮。华人对于用笮索渡的民族都称为管国，其实全是古羌族之进入河谷地区兼营农业者的统称，不是他们自呼如此。他们各支自呼不同，如邛崃山脉以东青衣江流域的羌支，自呼为“徙”（斯榆）。邛崃山外，大渡河流域的羌支，自呼为“白狼”；高原上的牧羌，则为牦牛种（旄牛王）。后来渐已接受华夏文化，与汉族有了共同语言，并皆改用皮船、木船、铁索桥渡江、不用溜索，“管国”的名称亦即消失了。

二、汉置管都县在沈村

《史·汉西南夷列传》说的以“管都”为沈黎郡，《汉书

注》引‘茂陵书’，沈黎郡有二十一县。我考沈黎郡治管都县，就在泸定沈村。所领二十一县，包括有旄牛（今汉源之清溪）、严道（今荣经）；徙（今天全始阳）青衣（今芦山 宝兴地亦属之），与定管（今盐源）、大管（今雅砻江下游 泸宁营 以下河谷）、管秦（今地难定、可能不出今盐边、木里、九龙地界）。余十三县不可考，大抵包括今泸定、康定、雅江、道孚、与九龙木里、盐源、石棉、汉源和雅、芦、宝、天、荣十四县地。那是大小夷王二十一个分据的地方。那些贪汉赏赐，震汉兵威，受汉招抚，纷纷请置官吏为郡县。实际是习俗不同，甚至语言不通，汉官无法管理，汉军亦难于到的地方为多。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贪在他们自愿来归，开拓边境，以利于打开通往身毒（今印度）大夏（今阿富汗）的路，便置了沈黎郡了。除青衣、徙、严道、旄牛四县当蜀邛大道有汉民与戍军外，大都以各夷酋子弟为令长，因其俗以治之。只郡守是朝廷派的带一批人去，分派到夷酋居邑，指导、联络、推行政令。山川险远，汉吏多不原往。成了“贤者不往，往者不贤”的郡县。反转造些夷汉矛盾，难以治效，所以建郡十四年便罢除了。

罢郡后，青衣、徙、严道仍还蜀郡；大管、定管、管秦三县划属越西郡。剩下广大地区，似皆交与旄牛王（驻今木雅乡）代管，一并隶属旄牛县。因为那些夷落都要到旄牛县来与汉商市易。于是朝廷设了两个蜀郡西部都尉，来镇守这些地面。“一居青衣主汉民（保护汉民管制夷民）一居旄牛主徼外夷”，（旄牛县徼外原沈黎郡诸夷落），郡治管都县这时怎样呢？大概亦是交还夷酋管理了。那里的夷王，便是唐代的“三王部落”中的刘王。今沈村所谓的“白马坟”便是唐代的刘王墓。这个刘王与天全的杨王，汉源的郝王，都是接受汉文化最早的管（溜索桥）地夷王。刘王开化最早，也最富庶。所以能建造那样宏伟的砖墓。他独富庶的原因，是因为康藏高原的牧民，与蜀地进行市易，原只有从康定木雅乡、逾雅加埂、下磨西面，过摩岗岭、到咱威河

边溜索渡过沈村、再逾飞越岭到邛崃山下清溪城（古旄牛县）蜀邛大道上来市易。（那时康定河峡尚无通路，另外只有从松潘入蜀的道路）。所以这个沈村渡极其重要，汉开沈黎郡，便选定了此处为郡治。那个无名的刘王在这建郡的十四年中，经常与汉官吏与汉地工农人民接触，深慕华夏文化，对汉朝廷世代效忠，也得到汉官的信任、从而富庶强大起来。成为三王之首。废郡后来曾保留笮都县原因，可能是一来汉官不原过飞越岭，也因为刘王是可靠的夷王。旄牛县官吏能控制他，故将其地与徼外夷地一并划属旄牛县。

三、晋代是晋乐县

晋乐县名首先见于《宋书卷三十八益州》晋原郡属县。原书云：“晋乐令《何志》故属沈黎，晋《太康志》无沈黎郡晋乐县”。沈约这篇“州郡志”工作是做得很细致审慎的，可以说它树立了整理纷乱庞杂旧史料，实事求是的典型，与《汉书·地理志》异曲同工。《班志》是使用完整旧簿籍的典型，《沈志》是整理纷乱旧史志的典型。由于东晋年代各州郡人民流徙所在成侨郡县，与旧有的州郡县区混杂淆乱，有的版籍，同名异地，加以随时移徙，坐在家里的学者，当靠文簿来编次州郡，只是一团纷乱，无法定出“真假包公”来。他只好混合序列各志所出，老老实实，进行核对，指出哪部书有，哪部书无，并不自己裁断，让览者自去分析。却因为他依靠真实，后人也就分析得正确。这是沈志最值人称道之处。《沈志》的益州“晋太原郡领县五”。那就是江原、临邛、普乐、徙阳、汉嘉。除晋乐外，全是汉代旧县。其地在今雅安专区这与温江专区的邛、崇、大三县。而晋乐这个县，是《太康地志》所无的。即是说：西晋时，还没有这个县。另一方面，西晋的太康末年，巴蜀已乱，邛州地面全已为“夷僚所据”。这个晋原郡无由新立。新立，也只能是邛州前身，不

合以江原为首县。可以判断，这晋原太守，是个侨郡。再看：在李雄与罗尚战争期内，蜀中的大姓世族，几乎全部都向外流徙了。史家综括为“东下荆湘，南入七郡”这两句话。（《华阳国志》）。南中七郡，越西郡（今西昌地区）与蜀郡交通最早，蜀民从此流入者必多。江原以下四县，流入越西地面是极其顺便的。入越西后，就地垦居，联合成立为一个侨郡，江原人多，便以江原为首县，郡名晋原、表示他们是不服从李雄新朝的“晋人”。临邛、徙阳、汉嘉三县人也不少，便各自组成为“侨县”。另外还有些其他蜀地流来的侨民，被摺在四侨县之外，则组合成为一个新县，取名“晋乐”。这样推断，是与当时西南社会情形符合的。不可能有人提出反对的理由来，至于晋乐县令驻在地方是否就是泸定境内，则是断断不可能从解放前的旧书里找出明文作证的。我初亦未注意这个问题。只在1959年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书时，反复研究大西南地区的地理形势，与民族活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资以分析旧籍里的文字，作出过这一假定，写进了这部书内。兹只谈我自己的论断：

泸定的沈村，是汉魏六朝时旄牛王国（牦牛种羌）与蜀郡市易的最大市场。所谓“以管都为沈黎郡”，便在此处。……沈村、冷碛、得妥和化林坪这带地面，是温暖宜于农耕的河谷，与四川盆地以大山相隔，李雄的军队不易达到。所流向越西的人留在大渡河谷而就地垦居的人多。通过大相岭向清溪、汉源、富林、大树堡一线旧路留下垦居的人多些。再由汉源盆地旁流入石棉盆地的人会比较少些，转入泸定盆地的人更少些，并且是更后来的。所以其地蜀郡地方来的人组成的晋乐县，合当在泸定多些。并因其地原是管都旧县，他们要求建成新的侨县更有充分的理由。不过不用管都而用晋乐的名称，表示晋人乐于居此，是很自然的。这虽是推断，是用历史地理科学方法创制的假说，尚待讨论和地下发掘来作验证，亦无人能够提出绝对不然的论据来，那便是值得信赖的假说了。

四、唐代置嘉良、大渡县

唐高祖初年（618）在泸定置嘉良县，名见《旧唐书地理志》，我考嘉良县在今泸定嘉靖河坝。原系住丹巴嘉良夷。因内乱支分来此居住，附唐请封，高祖因之立嘉良县。贞观初废县改嘉良羁縻州。隶雅州都督府，后转隶黎州都督府。唐末降附吐蕃更号嘉靖，嘉为其族称，靖是强大之义，其后属长河西土司。

大利县可能即是大渡县之讹，因为《旧唐书》边鄙地名多字讹……大渡则在唐仪凤四年（579）即曾置县，长安二年（702）省入飞越县（汉源三交坪为飞越故治）。仍留戍守称大渡戍，乾符二年（875）川西节度使高骈还就戍所筑大渡城。宋时汉源有大渡镇，《明统志》说大渡镇在黎州司北一百里。这些都是正史传志有明文的，我考其城即在泸定沈村。（说在《吐蕃传地名考释》）这与三王部落的历史有关系，元世祖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曾入雅州渡过此地。（另详《雅安地区地名考释》）

五、唐末至宋属“刘王”领地

唐末吐蕃与南诏先后侵夺西、黎、雅州，汉民又一次退出大渡河地区，本县成为“三王部落”中的刘王领地。三王部落即表示亲附华夏，又暗通吐蕃和南诏，使唐、蕃、诏都能保护他们的地方政权，维持商业交通。驻牧沈村的刘王先富裕起来，这个局面，保持到整个宋代。尤其南宋年代，由于陇右失陷了，茶马市易集中到四川西徼，三王部落擅居间之利，大渡河谷小土司勃兴，皆附三王。于泸定南境属刘王，天全县境属杨王、汉源县境属郝王。杨王与刘王争蕃茶市场，新开鱼通，岩州、打箭炉茶路。由于岩路险狭，不通驮运，只能用人力背负，当时称为“小路茶”。（至今仍把天全茶称小路茶，因其历史悠久，明清统制边茶于雅州，亦仍容许小路茶保存旧制）。于是杨王也富裕起来

了。（只旄牛、西州一路茶市不旺、商利较小）。

六、元隶两土司

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分兵三路，中路是他亲自率领，从阿坝草地循大渡河谷向南，鱼通、长河西等土司和河东的岩州土司率先迎降。时岩州土司名高宝锡，本天全杨王属下大头人，派驻岩州，既先迎降，并导元军入陷雅州。其时宋将与蜀人抵抗元军甚力，故忽必烈待东路大军不至，乃复渡大渡河往征云南。由是雅黎两州不隶四川（终元代）者垂一百年。高宝锡以功授天全六蕃招讨使。三王与木平诸小酋皆受节制。（编者注：六蕃指黎州、碉门、冷碛、沈村、叉道、岩州等地都在大渡河以东）。

元世祖又并长河西、鱼通、宁远三土司为一个宣慰司，其土官系木雅乡的瓦述族人。汉代的旄牛王在唐末消灭了，其地面发展为几十个小土官。降附吐蕃，奉喇嘛教，各自建造喇嘛寺。元征大理，这些土官迎降最早的是色巫绒土官。所以元朝奖励他，把迎降较后的长河西（即咱哩土司）鱼通（打箭炉也是鱼通地）宁远（即石棉土司失名）都划归他管。正如把刘、郝、杨三王与董、卜、韩胡都划归岩州迎降的高土司而称为天全六蕃招讨司是一样的。这两土司都见于《元史》并非明代才有。（编者注：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所属泸定境域均在大渡河以西）。

七、部分地名解释

（一）磨西面：汉代居住的是磨些（古读索）族，现称“拉哈族”。“面”是汉人加的，意指那面是磨些人居住的地方。现在又把“些”改成了“西”。

（二）长河西：从泸定经石棉的这段河流和安宁河，古代都称“长河”。河西即“长河西”。

(三) 宁远：磨西以下到石棉地带称“宁远”。

(编者曾面问有的说指乾宁地方确否？任老笑着说：那是按照我年轻时写的说的)。

(四) 冷碛：古代叫“东嘉靖”。西嘉靖即今嘉靖河坝。嘉指嘉良族，靖是“大”的意思。现称冷碛，“冷”是地名，“碛”是河坝的意思。

泸定桥概述

文 荣 普

泸定铁索桥，是大渡河上建得最早而又最长的一座桥梁。它不仅以川藏交通的要衢，著名的军事要津称著于世，更以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业绩驰名中外，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泸定桥的历史，历无专门著述，所见资料又十分零散，且不全。现作初步整理，以供参考。

一、建桥起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藏汉之间，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友好往来。唐代开始，又出现了以马换茶的贸易活动。至元代，四川的雕门（天全）成为茶马市场中心。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端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

要在大渡河上修建桥梁，引起清朝政府注视的，还是发生在1700年（康熙三九年）的打箭炉昌侧集烈之乱。

清朝初年，大渡河东岸的冷边长官司、沈边长官司归附清廷。1666年（康熙五年），大渡河西岸的长河西宁远鱼通宣慰使司——即明正土司也归附清廷。1696（康熙三十五年），西藏派出营官入驻打箭炉管理贸易事，四川巡抚于养志前往勘界，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但“居数年，营官喋巴昌侧集烈

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击杀明正土司蛇蜡渣吧，伤官兵”。

（《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六）清政府命侍郎满丕和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平定昌侧集烈的叛乱活动。唐希顺雪夜渡过大渡河，分兵三路进攻，“战五日，各路俱捷，歼蛮兵五千余，斩喋巴昌侧集烈，遂复打箭炉，喇嘛、番民俱降。寻抵木雅，番目错玉端柱等缴敕印，归附喇嘛、番民万二千余户”。（《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七）。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炉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史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渡，险莫甚焉！兹偕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拟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诏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御制泸定桥碑记》）

桥址安乐，即藏名“འལོ་”音译。也有译为“阿龙”或“阿垄”。据任乃强《泸定导游》考证：泸定桥东岸与安乐坝原是连成一体，都叫安乐。后大渡河改道，把安乐一劈为二，南面一段称安乐，叫安乐坝，北面一段则呼为桥上。当时把桥址选在这里，一则是西岸有坚固的岩石为天然桥基，二则是地名吉祥——安乐。

二、建桥经过

1、建桥时间 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卫藏通志·程站》：泸定桥，“康熙四十年建”。据《清史稿》，康熙三十九年三月，四川巡抚于养志被剥职（后被杀），由贝和诺担任四川巡抚职。如上所述，泸定桥是能泰在康熙四十三年二月担任四川巡抚后，上奏康熙修建的，动工时间绝不可能早于能泰上任时间。康熙四十年修桥的说法不能成立。其二是《雅州府志·津梁》载：泸定桥“建自康熙四十四年，成功于四十五年四月，告竣”。据泸定桥西铁碑碑文抄件（原碑已于1966年破“四旧”中砸毁）：“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初四未时合龙口”。又泸定桥西岸将军柱铸文。“康熙四十四年岁次乙酉八月造”。由此看来，泸定桥的修建时间，应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

2、修桥人员 监工官：“化林营参将杜汝（琨），化林营守备杨君（强），黎大所千总张鹏飞，提标千总汪弘臣，查阅官吉尔图，华时”。（据铁碑抄件，括弧内的字是根据其它资料加上去的）。铁工，据桥头将军柱铸文，有“陕西汉中府金火匠马之常”。相传，马之常系掌墨师付。普通人工，则从当地抽调。据《泸定县乡土志》载，沈、冷土司在修桥过程中是颇为卖力的。

3 修桥办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康熙中修建此桥，曾于东岸先系铁索，以小舟载铁索过重，未及对岸辄复，久之不成。后一番僧教以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再以铁索入筒，缚绳数十丈，于对岸拽其筒，筒达铁索亦至”。解放前多次参加维修泸定桥的老铁工认为，将铁索入筒是不可能的。按维修泸定桥时卸，上铁索的办法，是用青竹篾编结成起重绳，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篾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